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明程

第十四輯 第十三冊

清代科舉與詩歌（上）

張麗麗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四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3 冊

清代科舉與詩歌（上）

張麗麗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代科舉與詩歌（上）／張麗麗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2+158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四輯；第 13 冊）

ISBN 978-986-322-456-3（精裝）

1. 清代詩 2. 詩評

820.91

102014998

ISBN-978-986-322-456-3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四輯 第十三冊

ISBN：978-986-322-456-3

清代科舉與詩歌（上）

作 者 張麗麗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9 月

定 價 第十四輯 17 冊（精裝）新台幣 24,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清代科舉與詩歌（上）

張麗麗 著

作者簡介

張麗麗，女，1978年生，漢族，安徽滁州人。2011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上海大學博士後流動站工作人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元明清文學、科舉與文學、文學與文化等。

提 要

科舉制度是國家最重要的制度之一，統治者用它來調節和控制士人。清代滿洲貴族自關外入主中原，要重建社會秩序和價值體系，統治者充分利用了科舉以結納招攬士人入我彀中。

本書分為上下兩編，以清代科舉制度為考察背景，清代詩人的科舉遭遇為立足點，研究科舉如何影響了士人的人生命運，並因此影響了他們的詩歌創作。以典型詩人為切入點，考察一個詩人、一群詩人、乃至一種大致趨同的詩風的形成。

上編題為「故國哀歌到昇平暖響」。講述清代前中期的詩歌演進。清初詩風在博學鴻儒科的作用下從遺民詩的悲涼慷慨一變為「神韻詩」的溫柔空靈，其後沈德潛、翁方綱等接續王士禛以高位影響詩壇的傳統，為繼續向盛世邁進的清廷歌詠昇平，附和時代及統治者意願寫詩。

下編題為「科舉存廢與詩歌演進」。研究清王朝盛衰轉變的樞機中，科舉暴露出的不足，高才淪落的士人大量出現，寒士詩歌群起於野。進入末世後，清廷改革科舉並最終廢除。科舉的變革及廢止對士人產生的巨大影響形諸筆墨，一時古典和現代並存，傳統與新變雜糅。

本書試圖通過對清代科舉制度的一系列政策變遷加以考察，分析其對士人的影響，據此勾勒出科舉與詩歌之間交互影響、互相作用而推進的清代詩歌的演進史。



目次

上 冊

緒 論	1
-----	---

上編 故國哀歌到昇平暖響	13
--------------	----

第一章 清初詩壇	15
----------	----

第一節 野人今已擲儒冠——遺民詩人	17
-------------------	----

第二節 僅僅科名亦可憐——仕清詩人	32
-------------------	----

第三節 探花不值一文錢——清初暴政	60
-------------------	----

餘 論	66
-----	----

第二章 康熙博學鴻儒科與清初詩壇	69
------------------	----

第一節 融合之關紐——博學鴻儒科開科背景	72
----------------------	----

第二節 一隊夷齊下首陽——博學鴻儒科徵召 過程	76
----------------------------	----

第三節 誰聽秦淮舊竹枝——博學鴻儒科與清 初詩歌之變	82
-------------------------------	----

餘 論	101
-----	-----

第三章 太平詞臣 詩壇盟主	103
---------------	-----

第一節 鼓吹休明 流連風景——王士禛與 神韻說	105
----------------------------	-----

第二節 耆儒晚遇 歌嘯太平——沈德潛與 格調說	125
----------------------------	-----

第三節 斂才就範 學人之詩——翁方綱與肌理說	135
餘 論	157
下 冊	
下編 科場風雲與詩歌演進	159
第四章 盛衰之際的詩人與科舉	161
第一節 失士林之望——乾隆博學鴻詞科	161
第二節 自無官後詩才好——辭別宦海之乾隆三大家	167
第三節 不諧於俗——漸離仕途之浙江士人	190
第四節 有才畢竟青衫老——矢志科場之黃仲則	217
餘 論	254
第五章 衰世科舉與詩壇新變	257
第一節 重字不重文——龔自珍的科舉遭遇	257
第二節 三不朽——曾國藩幕府之立德、立功、立言	267
第三節 變時不畏天——太平天國科舉與詩歌	280
餘 論	290
第六章 末世科舉與詩歌突進	293
第一節 更搜歐亞造新聲——清末新政與詩歌探索	293
第二節 新舊文章兩不如——光緒經濟特科	302
第三節 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廢科舉與詩界革命	309
餘 論	323
主要參考文獻	327

緒 論

一、清代科舉研究回顧

科舉對於中國古代士人具有重大的意義，五代人王定保說：「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註 1〕科舉自隋朝建立，至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被徹底廢止而退出歷史舞臺，存在了 1300 多年。該制度集合了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功能，是一項影響了上至國家、中至家族、下至士人自身的基本社會制度。統治者借由科舉向士人灌輸儒家傳統文化。士人爲科考所需長期學習儒家思想，進入仕途後用來輔佐統治者維持封建官僚政治；家族也經由科舉振起或沒落。「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因爲家族的身份和地位無法世襲，只能通過科舉維持或上升，因此整個家族對科舉都無比重視，家族中的每一個男丁都因此而而有責任和義務奔赴科場，爲振興家族而奮鬥；最後，就個人而言，爲了實現修齊治平的儒家傳統理想、達到兼善天下的偉大抱負，自從出仕之途定型爲科舉取士制度，士人一生魂夢所繫，科舉而已。

科舉制度到了明清兩代發展臻於成熟。「完備、規範、有效、有

〔註 1〕王定保：《唐摭言》，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 年版，頁 97。

序」〔註2〕，作為國家掄才大典，高度穩固和連續，即便是在戰亂時期——如1900年庚子之變，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紛紛出逃導致科舉無法舉行，次年亦即下令要補齊1901年恩科和1902年正科鄉、會試。其考試形式固定化、科場條例健全規範化、考試內容標準化，作為一項取士制度，科舉在清代可謂達到了完善。

有鑒於清代科舉的重要性，學術史上對其一直頗為重視，自清代起學界對科舉的研究可大致分為這麼三個階段：

（一）萌芽期。自清代起即有數家著作研究和記錄本朝科舉。如著力研究科舉的梁章鉅，撰有八股文研究著作《制義叢話》和試律詩研究著作《試律叢話》，這兩部書對科舉的內容作了較為科學深入的闡釋。此外如法式善的《槐廳載筆》、和《清秘述聞》（後王家相有《清秘述聞續》十六卷，徐沅《清秘述聞再續》三卷），資料翔實，足為後人借鑒。清人還對特科給予了極高的關注，如杭世駿的《詞科掌錄》十七卷、《詞科餘話》七卷、秦瀛的《己未詞科錄》等都是關於清代制舉的。清代其它研究八股文和試帖詩的書籍所在多有，多圍繞著應試而著，此外還有散落在各家筆記中的零星資料。清代對科舉的研究多偏重於對資料的記錄和整理，當時還未有「科舉學」這一專門學問，清人多傾向於隨手記錄、有感而發，缺少理性的、系統的分析研究〔註3〕。

（二）發展期。經歷了晚清風狂雨驟的對科舉的批判之後，1905年科舉突然被廢除，對於這一巨大成果，士人僅僅只有短暫的興奮和

〔註2〕陳文新主編：《〈清實錄〉科舉史料彙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頁2。

〔註3〕「科舉學」作為一門專學，直到進入現當代才為人所提出和重視，如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的《中國考試史專題論文集》認為「一門新興的學科『科舉學』正在形成」（第7頁）；同時，廈門大學劉海峰教授研究科舉用力甚勤，他於20世紀末即預言「科舉學」將成為一門顯學。見劉海峰：《「科舉學」——21世紀的顯學》，《廈門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

滿足。不久熱潮退去，學界即開始了對科舉冷靜客觀、較為理性的反思和分析。最初仍多為回憶式的簡短文字。1926年張耀祥以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的24451名進士為對象，著成《清代進士之地理分析》，帶動了人才與地理的關係分析，啟蒙了之後不少學人。此後章中如的《清代考試制度》、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潘光旦和費孝通的《科舉與社會流動》等打開了後世研究科舉的通衢，他們的著作被譽為經典，至今仍為學界反覆引用，或贊同並深度闡釋，或存疑而反向求證，帶動了科舉研究的發展繁榮。

建國後由於政治等方面的原因，科舉研究一度陷入沉寂，取得卓越成果的當推商衍鎰的《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商衍鎰先生作為清代最後一科的探花，對科舉的回憶和研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同時，科舉的研究在海外成為熱點，中國臺灣出版齊如山的《中國的科名》（新聞出版公司1956年版）、劉兆瓚的《清代科舉》（東大圖書公司1977年版）等書各有側重，均在學術史上有一席之地。日本的科舉研究以宮崎市定為開山人物，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有系列著作問世。在美國，1955年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仲禮的《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為從科名角度研究中國紳士作出了重大貢獻。何炳棣1962年出版《中華帝國的成功階梯：關於社會流動》也顯示了西方有關科舉研究的豐碩成果。

（三）繁榮期。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舉研究空前繁榮，不僅數量巨大，而且富有創見、資料翔實、考據嚴謹。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朱保炯、謝沛霖的《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成為研究明清科舉的得力工具書之一。顧廷龍《清代硃卷集成》計420冊，卷帙浩繁。2009年，武漢大學出版社結集出版了陳文新主編的《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該叢書對研究科舉具有突破意義。其它如王德昭的《清代科舉制度研究》重點研究晚清科舉改革至滅亡這一段歷史，宋元強《清朝的狀元》將目光鎖定狀元之才，邱永君的《清代翰林院制度》關注翰林制度，張杰的《清代科舉家族》之「科舉家

族」概念的提出和深度研究，何懷宏《選舉社會及其終結》對八股文細探等，對科舉研究多有所創獲。海外如日本對科舉一直較為關注，1992 年出版了中島敏主編的《宋至明清科舉、官僚制度及其社會基礎》研究成果報告書等著作都表現了日本學界注重考證的研究特點。美國在此時期研究中華帝國晚期科舉制度的代表人物為著名漢學家艾爾曼，其陸續有著作面世，其中 2000 年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明清科舉文化史》更被視為近年美國科舉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

在這一時期，各大報刊雜誌上發表的有關科舉研究的論文和各大高校碩、博士畢業論文關於科舉的選題更是汗牛充棟，「科舉學」儼然成為學術研究的一門顯學。

二、清代詩歌研究困境

清代作為中國古典詩歌創作的最後一個朝代，如落入群峰前的夕陽，全力迸發出了絢麗、耀眼的光芒，誠為古典詩歌的集大成時期。就數量而言，僅一部《晚晴簃詩彙》所收錄的詩人就多達六千一百多人，約為《全唐詩》中詩人總量的三倍之多，而這還遠遠不是清代詩人的全部。就詩歌數量而言，因為龐大到無法統計，迄今仍然沒有一部清代詩歌總集出版。

古典詩歌經過數千年的發展沉澱，加之清代詩人往往兼具學人特徵，清代熱衷於對古典詩歌進行總結。各種詩學觀點層出不窮，彼此間有爭辯，卻不見前代為宗唐、宗宋彼此攻訐不下、乃至勾朋結黨、大加撻伐的情景，更多的像是一種對真理執著追求的友好氛圍。清代詩學舉其大觀，在格調、神韻、性靈三家，這三家詩說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美學範式進行了梳理和闡釋，不僅是對古典詩歌的總結，更可以從中看到儒、釋、道三家傳統思想學說的淵源〔註 4〕。與清詩本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當前學界的清詩研究，卻遠遠

〔註 4〕 見吾師嚴明：《東亞漢詩的詩學構架與時空景觀》，臺北聖環圖書出版社 2004 年版，頁 191～271。

無法與之相匹配。

晚清以來，學界逐漸改變了奉詩學爲正宗、詞曲和小說等爲小道的傳統，將小說和戲曲視爲明、清兩代文學的代表成果，「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之論已確立不磨，但矯枉卻容易導致過正，清詩曾經幾乎被打倒在地，對清詩的成就人們或冷漠忽視、不置一詞，或不以爲然、橫加譏評。魯迅在《致楊霽雲》一信中早就說過：「我以爲一切的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後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聖』，大可不必動手。」〔註5〕而聞一多在《文學的歷史動向》中對明、清詩歌尤其報以惡評：「從西周到宋，我們這大半部文學史，實質上只是一部詩史。但是詩的發展到北宋實際也就完了。南宋的詩已是強弩之末。就詩本身說，連尤、楊、范、陸和稍後的元遺山似乎都是多餘的，重複的，以後更不必提了。我們只覺得明、清兩代關於詩的那許多運動和爭論都是無謂的掙扎。每一度掙扎的失敗，無非重新證實一遍那掙扎的徒勞無益而已。本來從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工夫也夠長的了，可能的調子都已唱完了。……從那以後，是小說、戲劇的時代。」〔註6〕偉大如魯迅和聞一多都認爲自唐以後無詩，這是唐以後詩的大悲哀。誠然，唐詩有其豐神高韻、大家手筆，作爲詩人生在唐代是人生大幸運，那是詩歌的黃金時代，「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詩歌的春天中信手塗抹也成漂亮文章，堪爲後世傳唱。唐以後每一朝代的詩人無不在進行痛苦的反思、積極的摸索，想要在唐詩之外闢出一片新天地，於是有了宋詩的巉刻理致，明代的復古又反復古，清代的詩學更是豐富多彩，使人目不暇接。不能因爲唐詩的豐碩絢麗就隨意否定唐以後詩歌的獨特風貌，就像不能只偏愛春光的明艷燦爛而否定四季皆有韻致。唐詩是春花，清詩就是詩歌收穫的秋天，更豐富、更實在、更理性，也許收穫的倉庫中不僅有稻麥，

〔註5〕魯迅：《魯迅書信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下冊699頁。

〔註6〕聞一多：《文學的歷史動向》，《聞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聯書店1982年版。

還有秕穀，但這無法成為拒絕讚美收穫的理由。

關於清詩，繆鉞先生關於清詩「以量言則如螳肚，以質言則如蜂腰」〔註7〕之言已成不刊之論。清詩的數量龐大、資料充棟固然是優勢，但因為缺乏大型系統的資料整理，使得清詩研究在利用資料方面往往零星瑣屑，於是抓一把即成文章，往往吉光片羽，執著於清詩的一個角落。而認定清詩質如蜂腰的成見，更是影響學界研究清詩的熱情。目前的清詩研究成果不可謂不巨大，但是跟清詩自身的創作成就相比，仍然有相當大的空間。

三、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十五「文帝」條說：「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並行於天下而互為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儒者之統，是中國傳統士人識字之日起即被灌輸的責任，「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何等神聖、崇高的使命。關於中國傳統士人的特點，馮友蘭先生在其《中國哲學史新編》中指出，士與知識分子這兩個概念並不相當，後者只有社會學意義，而前者兼有倫理學意義〔註8〕。儒者有他自身的道德標準，《論語·里仁》說：「士志於道」，《論語·泰伯》中曾子亦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春秋戰國後期，禮崩樂壞，宗法鬆弛，官學被以傳播文化與政治知識為主的私學漸漸取代，因此不僅培養出大批士人，並形成「不爭輕重尊卑貴賤，而爭於道」的文化理念，如余英時先生所言，在中國歷史上，「知識人一開始便和『道』是分不開的」〔註9〕。這之後，「道統」成為士人存身立命的最高標準，

〔註7〕繆鉞：《黃仲則逝世百五十週年紀念》，《冰蘭盒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頁220。

〔註8〕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頁10。

〔註9〕余英時：《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見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

這就是儒者之統。

自孔子周遊列國、遊說帝王時起，儒者之統一直盼望與帝王之統結合，達成士人以道德和禮教實現仁政的美好理想。但是這樣的機會極難出現，因此孔子才最終回到家鄉，成爲一個教育家而不是政治家。正如孔子所說：「天下有道即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當天下無道，孔子選擇孤行而保存道，並通過教育培養弟子將道統傳承下去。自實行科舉制度選材以來，科舉就是士人實現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結合的最重要的途徑。科舉是帝王取士的方式，士人通過科舉考試，爲朝廷所用，從而進入仕途、報效國家，並傳播道統、實現修齊治平的理想。這樣的美好圖景一般出現在盛世之中。當國家進入繁榮的盛世，往往經濟發達、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秩序良好，科舉取士會實現相對的公平和效率，士人通過考試入仕的幾率較大，入仕之後也能相對積極地向帝王建言，此時，帝王之統一定程度上的與儒者之統實現了結合（當然，這種結合只可能是一定程度上的，帝王不可能完全執行儒者心目中的所謂「仁政」，那只是一種理想狀態）。當國家開始衰敗，科舉制的弊端就會凸顯，士人主動或被動地離開取士制度，與帝王之統分離，選擇獨自存身於江湖，著書立說，私學繼續保存和傳播道統。

在科舉時代，帝王之統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爲科舉取士制度，這是影響士林最重要的制度。帝王開常科、制科、恩科等等以招攬英雄入彀，也會製造科場案來整肅士人。清代與之前的歷朝歷代相似，終清之世一直貫穿著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的離與合。清代具有中國封建社會最成熟、最完備的科舉取士制度，研究清代科舉可以清晰地發現，士人對科舉的態度，正象徵了江湖草野與朝廷廟堂之間的離合之勢。滿洲貴族在入主中原尚未穩固時採取的是頻開科、廣中額的科舉政策，極大地籠絡了一部分漢族士人，爲建立滿清統治政權起了重大作用。順治年間科舉以案獄頻發、懲罰手段慘酷爲標誌，嚴重傷害了

漢族士人對朝廷的信任和熱情。康熙十八年（1679）博學鴻儒科徵召，對扭轉風會具有重要意義。雍正朝又以嚴厲的手段懲治科場案和文字獄，士人漸成離心之勢。乾隆末期國家已經走下坡路，士人主動絕意科舉或壯年致仕的不在少數。道咸間太平天國起義，戰爭連綿，太平天國雖然也學朝廷開科舉、行新法，但不被儒家士人所接受，反而激發了士人入幕維護道統的鬥志。在此時，幕府成為科舉的輔助形式，儒者借入幕向破壞儒教的太平軍作戰，並獲得進身之階。進入光緒朝，為求自救朝廷試行新政，對科舉進行了改革和維新，最終導致了1905年的科舉遽廢，造成了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並形成了近代以來的文化斷裂。

士人保存道統最主要的形式是著書立說，其中，創作詩歌就是一種主要的途徑。古典詩歌傳統的「言志」和「抒情」兩大功能，使士人能夠自由地借詩歌描寫對道統的思索、闡述、維護和傳播，抒發內心激昂、低回、振起和期待等等各種情感。在國家興盛或者衰敗的不同時期，儒者之統和帝王之統之間呈現變動不居的離合之勢，科舉也因此表現出相對的公正、清明，或腐敗、混亂，儒者通過科舉向帝王靠攏，或者背棄科舉而存身江湖。相應的，詩歌創作就呈現不同的風貌。

四、科舉與詩歌關係研究

科舉與文學是分屬不同學術領域、但卻彼此血肉相連、關係密不可分兩個研究課題，正如應舉和作詩是古代士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兩件事一樣。關於科舉對詩歌創作的影響，歷來眾說紛紜，贊成者如袁枚，他認為「無科名，則不能登朝，不登朝，則不能親近海內之英豪，受切磋而廣聞見；不出仕，則不能歷山川之奇，審物產之變，所為文章不過見貌自臧已耳，以瓮牖語人已耳。」〔註10〕科舉時代的人也常

〔註10〕袁枚：《與備之秀才第二書》，《小倉山房文集》卷三十五，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袁枚全集》第二冊，頁643。

有對八股、對試律的肯定，認為至少訓練了技藝，為文學創作打下了紮實的基礎。但同時更多的則是士人對科舉的口誅筆伐，討伐其對人才的戕害，在「科舉的陰影」中難以積極看待其對文學造成的影響。蔣寅認為，舉業「給文學創作造成極大傷害，甚至從根本上褫奪了人們在文學上取得偉大成就的可能。」〔註11〕其論文《科舉陰影中的明清文學生態》中羅列了許多古代士人反對時文、反對科舉的言論，但他自己也同時承認，科舉的負面影響是很難量化統計的。任何一枚硬幣一定存在正反兩面，沒有一件事物是百無一用的，更何況存在了1300多年的一項取士制度。單純地以好、或者壞來定性科舉對文學的影響未免失之武斷片面，科舉與文學之間的關係微妙、複雜，又無比深廣，是一個值得大力研究的課題。

中國古代士人秉承「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科舉與士人人生經歷和情感體驗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正如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舉與文學》一書的序言中說：「有哪一項政治文化制度像科舉制度那樣，在中國歷史上，如此長久地影響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態呢？」〔註12〕科舉影響了詩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也就相應地影響了他們的創作。以往的學術界將科舉制度習慣性劃入史學範疇，與文學屬於截然不同的兩個領域，而傅璇琮先生基於科舉與文學間有緊密的聯繫的認識，開創了「科舉與文學」這一跨文學與歷史研究的課題，其著作《唐代科舉與文學》的研究方法和寫作範式足為後學者借鑒。目前學界對科舉與文學之間關係的研究，以唐代較為深入，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俞鋼《唐代言言小說與科舉制度》，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鄭曉霞《唐代科舉詩研究》等。相比較而言，明清的科舉與文學關係研究則較薄弱，較為突出的成果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陳文新主編的《明代科舉與文學研究編年》，該書洋洋500萬字，首次以編年形式展現了明代文學與科

〔註11〕蔣寅：《科舉陰影中的明清文學生態》，《文學遺產》2004年第一期。

〔註12〕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頁3。

舉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其歷史進程，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對象和跨學科研究視閥兩方面均有創新之處。嚴迪昌先生的《清詩史》在論述清代詩人境遇和詩歌創作時，每多注意到詩人的科舉遭遇，並著力挖掘其間的內在關聯，這一研究方法給筆者很大啓迪。

清代以來，科舉對詩歌創作的影響同樣深遠。明清轉捩的關口，是否出應新朝科舉成為士人出處的基本原則之一，也由此決定了一部分士人的輿論判斷和歷史形象，將士人一生釘上「貳臣」的恥辱柱或者寫入「遺民」的忠義譜（若身受前朝國恩又出仕新朝，則被目為「貳臣」、「兩載人」，但那些未獲前朝功名的「新人」則往往不受此道德標準束縛），因此對他們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徐志平通過梳理明遺民杜濬兩舉不第和明亡後放棄諸生身份的人生軌迹，分析了杜濬性情人格的微妙變化，指出「科考對杜濬詩歌的影響在於，一是不斷復述失敗經驗，創作了一些與科舉有關的詩，二是將窘迫之境詳為描述，創作了大量的述貧哭窮詩。」〔註13〕同時，江西師大的李舜臣討論了康熙十八年的博學鴻儒科對康熙詩壇的影響，認為「康熙詩壇格局的三個表徵，即由遺民詩人的退隱和新朝詩人的興起所引起的創作主體的消長，詩壇重心由偏重南方而至南北均衡，詩壇盟主的代興，都與博學鴻儒科有相當緊密的關聯，這次特殊的科舉考試堪稱康熙詩壇格局新變的關捩。」〔註14〕以上僅舉兩個事例，就可見出清初科舉與文學間的聯繫，已經引起了學界的注意，其中大有可為。清初之時，明遺民之堅持不出是由於無法臣服於少數民族的統治，因此獨自存身以保存道統。士人繼承了杜甫的「詩史」傳統，詩歌中現實主義精神顯著增強，詩作也多有壯美的氣質。康熙十八年（1679）朝廷開博學鴻儒科，士人被極大地籠絡，內心不同程度受到了感化，遺民或卒、或變節、或隱居，詩壇上活躍的是王士禛為代表的科舉順利、

〔註13〕周勇、徐薇：《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文史知識》2009年第3期。

〔註14〕周勇、徐薇：《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